

## 謝巧玲訪問

日期：2009 年 1 月 20 日

時間：下午 4:45 至 6:15

地點：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（香港仔華貴邨）

受訪者：謝巧玲校長(謝)

訪問者：梁操雅博士(梁)、劉思詠小姐(劉)、黃浩然先生(黃)

---

謝：第一屆同學在畢業後的三年，便組織了同學會，即「葛量洪教育學院在職幼師訓練班畢業同學會」，當時吳卓文靈是最大的推動力，她從前是我們葛師第一屆的班主任，後來成了首席督學。她認為若要發展幼兒教育，和建立渠道推動幼兒教育，便必須組織同學會，由同學會擔當推動的角色。同學會組成後，我們一直希望政府提供「複修課程」。當時並無 QKT 或 CE，我們認為同學在畢業 10 年後，有需要修讀這樣的「複修課程」。但據當時的蘇麗珍院長說，由於政府並提供無提供任何資源，讓學院舉辦這些幼兒課程，故此沒有開辦。校友會一直透過不同渠道爭取，直至學院成立，認為幼兒教育需要提升，1995、96 年開始才出現了證書課程。這亦源於政府政策上的改變，訂明合格老師的比例需按年達到百分之四十、六十。我記得當時的 CE 課程在長沙灣上課，樓下有很多商場，所以我們經常逛街。證書課程為期兩年。

梁：將來出版的書會是一個系列，我們希望以院校為單位。我知道區永佳亦有一個校友會（註：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），將來我們亦可能訪問他，但我們其實不只談校友，而是藉此帶出葛師當年如何發展起來，以及為何在那個特定的時候出現。幼兒教育業界其實多年前已發展起來，正如校長剛才所言，證書課程正是校友推動的成果，故此我們希望多了解證書課程出現以前業界的發展，也希望校長能夠借出當年畢業證書的真本。

謝：其實我亦寫了一篇文章，這篇文章是談教育政策，但不太齊全 ...

梁：我們的目標有幾方面。第一是幼兒教育在港的發展情況；第二是 80 年代初業界所要求的培訓課程，這便帶出葛師 QKT、QAKT 或 CEKG 課程的出現，一直可談到今天的發展，校長可以就你所知的告訴我們；第三是幼師接受培訓前後如何回饋業界；第四便是校友會的角色，我們需要你在這方面提供資訊。

謝：在 1950 年代香港已有幼兒教育，但當時的幼兒教育並不鮮明地以幼稚園出現，而只是「小學副產品」，叫「預備一年班」。因為那個年代的孩子滿七歲才入讀小一，於是孩子五歲多便會入讀「預備一年班」。真正的發展是在 1953

年，當時教育司署設立了「幼稚園組」，在 1950 至 53 年間已慢慢形成了幼稚園教育，但它的作用不是監管課程，而只作為資訊的提供。在 1950 年，羅富國教育學院曾開辦兩年制的部份時間幼師課程，但不知何故 1953 年便結束了，接着教育司署於 1956 年又開辦了兩年的部份時間課程。當時是兩年收生一次，只收三十多個學生，第一批畢業生目前已全部退休了。自此教育司署便一直進行培訓工作，但當時人手其實很少。

直至 1971 年因為人口膨脹而發展迅速，當時的政策是一位老師教授 35 名孩子，但實際上當時我一人便要教導 56 名孩子。我對校長說，如不另聘助教，我便辭職不幹了。每次下了課，第二天我便開不了聲，因為只由一人負責教孩子讀字、唱歌、寫字。我們要彎下腰教導每個孩子執筆寫字，即使只是教他們寫個「一」字也累得要命，放學回家腰骨也硬了，所以當時真的很辛苦。

到了 1981 年，政府頒布《小學教育及學前服務白皮書》，建議學童到了 3 歲零 8 個月，便該入讀幼稚園，政府這時才開始進行師資培訓。當時的師資培訓實在缺乏，沒有太多人接受正規訓練，很多均是中五畢業後便到幼稚園教書，於是便要看看所跟的師傅的好壞了。像我便算幸運 ... 其實我初時亦不太幸運，因為 1970 年代沒有師傅可跟，校長聘用了我，便告訴我負責教授哪課書，於是「刀」便說是「刀」，「尺」便說是「尺」，僅此而已。還記得當時有數學、認字、常識和英文 ABC 四科，再加上唱遊和體能，當然「體能」其實只是排隊溜滑梯、騎木馬，擲豆袋也是後期的事。就只教授這些東西，因為只有一名教師，實在無法兼顧太多。

很幸運，我在 1981 年任教北角衛理，那時才算真正跟師傅，有分組教學。過了一段時間，1982 年我入便入了葛量洪，當時是第一屆的培訓。那時的情況十分有趣，部份學生是葛量洪培訓，部份則是教署司署的 12 週培訓，那些是 QAKT，而我們的則是 QKT。有些同學考不上，便先入讀 QAKT，第二年才報讀 QKT，這樣成功的機會便會增加。但 QAKT 的學額其實也不多，好像只有兩班，葛量洪兩年制的則有四班 ... 我不肯定 QAKT 有兩班還是四班，應該也是人多的 ... 就是這樣同步進行的。

黃：當時入學考些什麼？

謝：很精彩的。當時面試我的，一位是鄭太，另一位是梁太（我也不太肯定是不是她），兩位導師面見一名學員。他們問我教學的方法、會否教授英文，看看我的反應，也會看學歷。如果學歷較高，被取錄的機會亦會較大。當然亦會看表現，當時我的同事跟我擁有相同學歷，結果學院只取錄了我，原因是那位同事回答其中一條問題時表現不佳。

黃：當時的學院是否以中五或中七畢業的學員為主？

謝：很少中七畢業的，以中五畢業的為主，當時中七畢業的很少任教幼稚園，主要是入讀師範小學課程。因為當時在職師範小學教師的入學要求並不十分嚴格，很多人寧願入讀夜師（註：ICTE），也不會選擇到幼稚園任職。

梁：在我的年代，人們不一定要入讀幼稚園。幼稚園成了不成文規定的基礎課程，其實是何時開始？是 60、70 還是 80 年代？

謝：大概是 1960 年代，香港經濟起飛，多了雙職的父母需要把子女送到學校托管，才可外出工作。

梁：這點十分重要，令幼稚園慢慢變成了正規課程，人們需經過三年的幼稚園教育，才會升讀小學一年班。開始時這是不成文的，但漸漸發展成現在的模樣，使老師更需要規範和培訓。

謝：在 80 年代，我一班有 45 名學生，上午一位老師，下午則是另一位老師。但這已比私校好多了，因為私校同一名老師同時任教上、下午課，分別有 40 名學生，沒有助教。

梁：我覺得這個訪問十分珍貴，因為現在幼稚園教育十分重要，但在過程中有很多的辛酸，而其發展亦是階段式的。

謝：當時最大的推動力來自陳淑安和陸趙鈞鴻，這兩位前輩在推動改革方面 ... 他們主張遊戲學習，將美國那一套引進過來。

梁：我在這方面的認識是較晚的，只是進了教院以後教授 QKT 或 CEKG 的課程，跟學員接觸多了，便嘗試了解業界的情況。我發覺目前在三個層次上 — 幼稚園、小學和中學 — 你們在學與教方面是走得最前。孩子進了小學，情況便截然不同了，很多 Factual Recall 的東西。

謝：到了 1986 年以後，整體教學越來越多採用遊戲學習的模式。

梁：我接觸的情況是 1995 年以後，當時差不多整個業界已肯定了遊戲學習的成效。

謝：因為之前仍是採用傳統式教學，一個人一個位，就像小學一樣。由於葛量洪的師資培訓 ... 到來視學 ... 我還記得當時有位同學在新界的學校任教，是

那些由祠堂改裝為幼稚園，完全不懂何謂活動教學，就像小學模式那樣，只教寫字、讀書，於是那名導師過關時便十分辛苦 ...

梁：適逢其會，我也教了幼師兩至三年，進行了觀課，當時有 **Advisory** 和 **Assessment**，我便負責 **Advisory** 部份，所以在這方面我也有點經驗。

謝：當時的班房是每人各自坐在枱前，那位同學不明如何可以變成小組。導師很好，教他將枱拼合起來，成了一個長方形，於是便可分成小組。還記得當時他還邀請了家長幫忙帶小組，讓導師觀課。當時十分艱苦，因為學校沒有資源，沒有一籃籃的玩具讓孩子選擇，沒有什麼「小家庭閣」，什麼也沒有。當時是將一大籃積木分給孩子，每人分得數粒積木玩耍，老師則在一旁批改習作。

梁：我們知道香港的幼兒教育的發展有很長的歷程，但其實有系統或有規模的發展，是 1950 年代以後的事，請你談談這方面的情況。

謝：1949 年中國大陸開放，很多國內的人來港，香港人口突然膨脹。當時很多小學都把收生年歲推前至五歲多，但這些不被稱為幼兒教育或幼稚園教育，而是「預備一年班」。其後這些「預備一年班」的收生年歲更逐步降低，但那些給 4 歲孩子入讀的不可被稱為「預備一年班」，於是便變了「幼稚園教育」，至於為何叫作「幼稚園教育」則無從稽考。但這些幼稚園設於小學校內，只是附屬品，有一班或兩班開課。直至 1953 年以後，便有很多獨立的幼稚園出現，在一個很小的地方開辦數班。到了 1950 及 60 年代，幼稚園一直發展。

其實在 1950 年代，羅富國師範學院曾經開辦幼兒培訓，但可惜兩年後便停辦了。到了 1956 年，教育司署開辦了幼師培訓，但只招收數十名學生，每兩年招生一次。故此，當年幼師很多，但培訓工作卻很少。不過，很多有心投身於幼兒教育的老師在完成中五課程後，便到澳門修讀師訓課程，回流的幼師有很多，例如寶血幼稚園的葉寶珍主任。

梁：依你所言，不論是斷斷續續的培訓，還是常規的課程，均與幼師的師訓很有關係。就你的個人經驗而言，你大概是何時正式接受訓練？培訓的情況、課程內容與受訓時的生活又是怎樣？

謝：我在 1970 年代已經入行，當時幼兒教育什麼也沒有。情況就像小學一樣，每名學生坐一個位，就是俗語所說的「一腳踢」，早上教一班，下午教一班。除了認字、常識、數學和英文 **ABC** 以外便無其他書籍，音樂課則是唱《小小

姑娘》—「小小姑娘，清早起床 ...」那樣子，還有《快樂笑笑》，亦有一些西方普通的歌曲，像“London's tree is falling down”，就是將這些琅琅上口的兒歌當成歌曲教授。

我當年比較幸運，1980 年便進了北角衛理，明白了什麼是幼稚園教育和分組教學。我本習慣了逐個孩子執筆寫字的教學模式，最初來到一間活動式教學的學校，適應起來相當辛苦，例如如何分組坐校車、分配不同類別的學生等，我要花上半年才懂真正帶領小組教學。進了北角衛理兩年，正值教育司署認為幼稚園教育應該發展（因為 1981 年的《學前白皮書》已說明必須在師訓方面多做功夫），葛量洪教育學院便開辦了師訓課程。我便是第一批入讀師訓班的學員，當時叫做 QKT，而教育司署亦同步舉辦了 QAKT 的 12 週課程。未被葛量洪取錄者，便可先修讀 QAKT，到下次招生時再次投考。

到了 1983 年畢業，我們其實一直希望組織一個同學會，當時我們的班主任吳卓文靈（註：後來成為教育司署幼稚園首席督學）很鼓勵我們這班曾受正規訓練的同學，向政府爭取我們的合理權益和幼兒課程的監管等。在 1986 年時，三屆同學便一起組織了同學會。當年我們什麼也不會，所以同學會的組織非常簡陋。剛巧聖公會陳校長的女兒是名律師，她助我們起草了一份英文註冊文件，其後亦一直在註冊過程中協助我們，最後同學會終於成立了。當時主席是邱少霞，她和我們為幼兒教育發聲，舉辦了一些專業課程和講座等。

到了 1990 年代教育學院正式合併成立以後，我們亦一直推動幼兒教育。不過，其實自葛量洪同學會成立以來，我們一直向學院反映幼師畢業後十年，便應修讀「複修課程」，因為其實小學亦有這樣的「複修課程」。當時葛量洪的蘇院長表示，因為學院沒有資源在這方面進行額外的培訓課程。於是我們一直等待，到了學院合併以後終於設立證書課程。由於工作關係，我沒有修讀第一屆；我是第二屆的畢業生。當時是有喜有悲，喜的是可以深入研究幼兒教育的學問，悲的是因為當時我已擔任校長，工作量多，壓力亦大，一邊讀書一邊兼任行政工作，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。

此外，同學會亦一直推動職前課程，學院到了 1997 年終於開辦，這對幼師而言無疑是個大喜訊，因為要在職教師改善教學技巧會較為困難，相反，如一張白紙接受正規訓練，將來他們可在幼兒教育貢獻良多。同學會亦在不同的政府部門發聲，亦希望職前教育盡快落實。到了真的落實後，三年後首批投入服務的學生獲得很佳的口碑。到了現在，更有碩士課程的出現，將來學院可能還有博士生等。故此，進展可說是沒有停步。

梁：剛才聽畢你說幼稚園培訓的發展，你個人亦經歷了不同階段的訓練。你是如何將訓練回饋在工作之上？

謝：從前我們沒有這麼多的「恩物」（註：指玩具）讓孩子玩耍，但現在我們主張創意思維。我們不需規限孩子做些什麼，由他們自己創作，然後我們會問他們這個東西是什麼 ... 在教學裡，我們不會限制他們砌一把劍，而是由他們自己創作。在玩耍的過程中，如他們不喜歡或覺得沉悶，可以轉到「家庭區」玩耍。我們會給孩子多點空間，讓他們自己選擇到「家庭區」或「積木區」，這於教學方面是個很大的轉變。

梁：我想你定是花了很多心思在這所幼稚園上。其實在幼兒教育的訓練裡，除了孩子的學習，學院有沒有為你們提供有關幼兒學習環境的知識？

謝：我們很着重環境的佈置，對於幼兒的發展，我們不能將小學的那一套搬到幼稚園教育。故此，我們每個區域均是就着兒童的發展而設。從前並無環境佈置這回事，只有一個個課室，隨便推砌一些東西，但現在教學進步了，從環境誘導孩子學習是重要的一環。

梁：從環境的佈置，我希望延展一下。現在很多講法是學習不一定發生在課室裡。當你將學院受訓的內涵應用出來時，除了在學校上課，孩子有機會在其他場合進行學習嗎？

謝：絕對有。例如說衣服，我們不再只是拿些衣服給孩子看，而是帶他們到服裝店，感受售貨員如何賣衫，以及他們買衣服時該如何作出選擇。來到服裝店，他們懂得指出某件是嬰兒服，看見某件 T 恤，又懂得說媽媽會購買這一件。這正是環境教學。

梁：回顧過去，幼稚園教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。依你的專業意見，幼稚園教育在未來數年將會出現什麼改變？

謝：由於教育政策的改變，例如政府現在規定所有幼稚園教師均需於 2012 年以前取得證書資格，教師在培訓時學到教學的知識，在課堂應用方面將會是個很大的進步。此外，校友會亦擔任促進外地交流的角色。我們剛於 12 月帶領了 40 名教師到訪南京師範大學，上了有關藝術遊戲的六天課程。這個課程為我們在音樂和遊戲方面帶來很大得着。在 1 月 18 日，南京師範大學音樂系的許卓雅教授亦來到香港，就音樂遊戲講了一課。許教授教導我們只需用手配合音樂，不用跑跑跳跳，亦可同樣好玩。從一些如《草原情歌》的兒歌，她亦向我們介紹如可在課室安排簡單的比賽，這是在教學上的進步。我

希望隨着社會對幼兒教育的重視，我們可將教學質素推到最高峰。配合學院如課程方面的未來發展，除了學士和碩士課程，我希望能盡快出現博士課程，令幼兒教育在技巧和知識方面可繼續向前推進。

梁：剛才你提到校友會於學院裡成立，亦有談及校友會的活動。成立校友會當然是建基於一些理想和精神，你認為校友會在業界和學生學習等方面，應該扮演什麼角色？

謝：校友會真的可以反映業界的聲音，現在教育局亦有邀請校友會討論課程或政策的改變。我們會搜集業界意見，然後向教育局反映，並作為溝通橋樑，令改進可更深入一點。

梁：你在 1980 和 1990 年代都曾接受培訓，我有興趣知道兩段時間的課程內容和培訓特色會否有所不同？

謝：有很大的不同。1980 年代在葛量洪教育學院時，我們真的不知什麼是培訓工作，上學時就像「一舊雲」。因為當時第一批導師也是處於摸索期，大家也在探索。做功課時有時候我們不知怎樣寫才是最好，於是只有各施各法，然後才是磨合。導師將最好的給我們分享，我們才發覺自己原來不懂寫東西，於是便去「惡補」、看書。那時候到圖書館還不懂得找「幼兒」的書來看，而翻譯的書又少，大部份都是英文。由於我們不知道該找哲學、教學還是課程的書，於是做小組功課時，每人都拿著大疊書籍，每本也看看是否適合。做功課時也會出現一些磨擦，因為大家的意見不盡相同，也不知道這是對是錯，更不肯定應否依循這個方法去做，於是唯有慢慢摸索。

即使應付個人功課也有很大困難。當時我已有教職，幸運地剛到了一間實行活動式教學的學校任教，可以很容易將課堂所學在課室中運用。一位同學跟我們分享他視學的經驗，由於他的學校仍然實行傳統式教學，學生一個一個的，每人一張枱、一張椅，他完全不知道小組教學可以怎樣實行，因為別人有長枱可用，可他卻沒有。幸好當時導師教他將小枱拼合成一張長枱，於是解決了他的困難。另有一位同學，當視學的導師在門外按鈴時，他當即暈倒了，原來是因為壓力太大！雖然當時我教書也有好幾年，但導師視學我也會手震起來，上課時不知自己在說什麼。本來我可跟足教案來做，但不知怎的會揭錯了 ... 明明今天不是進行這項活動，而是計劃了另一項活動的，怎麼我會弄錯了 ... 協助我的導師也十分迷惘，因為教案明明是說做這項活動的，而且已給我準備了些東西，但教學時卻變成了另一回事情 ... 然後我才重新糾正過來，根據活動課程來做。這就是當時教學的小插曲。

到 1990 年代，因為當時我已擔任校長，要培訓便辛苦多了，因為我再不是前線工作者，平日是做行政工作。當導師視學時，我便要選擇到某一班教學。我跟那位班主任說：「我每周要有三天到這班教學，你要預留一些時間給我教學。」那位班主任覺得很煩，因為他認為我的課程跟他的好像毫無關連，變成各有各做，老師和校長之間便發生了少許衝突。幸好老師也體諒校長要通過視學才能過關，後期彼此解釋多了，我也將自己在課堂中所學的跟這位老師分享。這位老師感到孩子真的受惠了，而自己在教學上亦增益不少。到了下學期我再到他那班教學，他已沒有那麼多的怨言，彼此的合作關係亦進步不少 ... 這是截然不同的，一位教師接受視學，可能會認為是一件異常簡單的事，但校長較多處理行政工作，進入課室的機會不多，每天可能只花一小時，每星期也不過三天，連孩子的名字也會弄不清，要牢記三十名孩子的名字，便得花上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，然後才談得上磨合。

在教學技巧方面，更多的學識為我自己的看法和技巧帶來很大變化。例如我們帶孩子到公園，以前那位主任便做得不好，雖然之前已經探了路，但這麼多班別一起走，結果沒能看到多少東西。前面那批在走，後面跟着的只好停下來。後來我們才知道要將孩子分組，這班孩子行這邊，那班孩子則行那邊。還有，由這邊到那邊需要多少分鐘？介紹的內容又是怎樣？孩子回來後有什麼延展活動？這些都是我們將在課堂中學會的知識應用於教學之上，所以教學設計十分重要。

我們在 1980 年末至 1990 年代倡議職前培訓的重要性，因為尚未入職的教師就像一張白紙，他們可將課堂上學會的東西在實際教學中發揮，但如要將已「學壞師」的教師糾正，難度便相當高了。我們校友會一直向學院反映，希望他們提供職前課程。這當然亦與政府的政策有關，因為這牽涉資源問題。到了 1997，在教育政策改變的背景下，職前課程終於出現了。現在教師還可一直攻讀至碩士程度，然後重新投身幼兒教育界。我認為未來的發展還看政府資源投放的多寡。

在 2006-07 年推出的「學券」是否真的能幫助業界？直至今日為止，我還未看出它的成效。但在未有成效以前，我們這班教師已承受很大的壓力，因為培訓工作加速了。在 2012 年，所有在職的教師必須取得證書資格。由 2006 年至 2012 年，也不過是六年時間，我們怎可推動全部已任職的教師讀書，從而取得這個資格？讓老師外出受訓，學校的壓力在無形間增加了，代課老師也只能解決我們一部份的難題，因為作為班主任，他們的工作其實無法減輕，同時他們也得應付培訓的功課。曾經有一個外出學習的活動，我問一位老師可否出席，但那位老師說：「校長，我有兩份功課還未完成呢！」在長假期裡，老師需要趕交功課和應付考試，還可能要預備下一個課程，所以其



實無法真正休息，老師在這樣的壓迫下十分吃力。

當時政府宣佈所有幼稚園教師必須在 2012 年前全部「上車」，取得證書資格，我是第一個人作出反應，因為我認為時間實在太短。政府最初的期限是五年的，我說五年一定不可能。雖然目前教院、中大、浸大和公開大學已有這類課程供教師進修，但我們可別忘記教師除了上學，還需應付功課。我們這些曾經受訓的教師也都知道，完成一份功課並非易事，需要看大量參考書。我曾在教育局反映，如果到了 2012 年有教師已經在學，但尚未完成課程，當局亦應給他們一個機會，承認他們的資格，而非過了這條界線便不能在這校任教，我認為這樣對教師並不公平。

梁：政府是要求所有已在職老師皆具此資格，還是老師在入職前必須已具此資格？

謝：原則是所有教師，包括新入職和已在職者。新入職的是必定的，現在我們也不敢聘任只有 QKT 資格的。有時候，教師是否具備證書資格受着很多因素影響，例如家庭因素和身體狀況，也會影響他們能否在這兩、三年間完成證書課程，所以我一直主張將培訓時段延長一至兩年，讓更多同工不會因為這個限制而未能取得資格。

梁：這方面我也有一點感受。因為從前教授從事幼兒教育的學員，也知道他們十分辛苦，特別是 CEKG，學院的要求其實頗高，上課時間亦很密集。

謝：我們也曾向教院提供一點意見。他們的學士和碩士課程要求學員到大埔校園上課，我自己便是其中一人。我們希望學院可以安排部份學員在市區上課，結果學院終於在去年改變了做法，學員可選擇在市區或大埔校園上課。這反映學院願意接納我們的意見。

我們從事幼兒教育，常常感到自己是「弱勢社群」，因為我們永遠要發出很大的聲音，才能得到很少的收獲。有同學提議我當立法會議員，將業界的聲音帶進議會，於是十二年前我便毅然參選區議員，雖然經歷三次落敗，但我沒有放棄，因為這就是我們幼兒教育者的精神。到了 2008 年（註：2007 年 11 月區議會選舉），我終於當選了華貴區的區議員。這個位置真的發揮了一點點作用，例如我可以將教師在學券制下面對的壓力，提上區議會的議程，以往則沒有這樣的途徑進行辯論；葵青區亦有一位校長是委任的區議員（註：林翠玲女士），他在該區區議會亦會提出相同的辯論。我們的校友會和教職會前陣子也進行了上述議題的問卷調查，結果已向教育局反映。還有綜援家庭欠學費的問題，我們亦不停發出聲音，現在不論是否綜援家庭，只

要是適齡兒童便需領取學券。有了學券，即使有差額也不致令業界損失太大。曾有學校向我們反映，欠交學費的學童多達五名，總額已等於一個老師的薪水了。所以我一直希望將我們所學回饋社會，同時將我們的聲音帶到社區，也讓孩子學習我們怎樣在社會求生。

梁：你道出了業界的心聲，說得很好，我也沒有什麼再補充了。非常感謝。